



六经无「词」字，通作「辞」。《说文》：「辞，一曰对，一曰谢，一曰诃，一曰罪过，一曰相问，一曰对告。」
 词别。《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明乎「词」者，意者，一曰对，一曰谢，一曰诃，一曰罪过，一曰相问，一曰对告。
 我言者，而后可以尽我之词，故隶司部。意者，一曰对，一曰谢，一曰诃，一曰罪过，一曰相问，一曰对告。
 内，意与志不同，与诗不同。一曰对，一曰谢，一曰诃，一曰罪过，一曰相问，一曰对告。
 言，诗声，古文从言，之声。一曰对，一曰谢，一曰诃，一曰罪过，一曰相问，一曰对告。
 出，一意孤行，随其心之所之，以求合于六义之盛一。用
 天地，通神明，惊风雨，泣鬼神，以成一家之言，理至

词

史

刘毓盘 著

沙先一 导读

毛文琦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词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史 /刘毓盘著;沙先一导读;毛文琦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325-5639-7

I.词… II.①刘…②沙…③毛… III.词(文学)—文学史—中国 IV.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4066号

责任编辑 方晓燕 何许英

装帧设计 田松青

版面制作 周爱明

词 史

刘毓盘 著 沙先一 导读 毛文琦校点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制版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6

印张 6 2/36 插页 2 字数 120,000

印数 1-5300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639-7/I·2222

定价 17.00元

民国时期是词学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期。转型的重要表现之一，即为通过词史的撰述，对词体文学知识谱系与演进轨迹加以梳理、建构，对词体文学发展史予以系统的理论探究和规律性的把握。词史的撰述又与民国时期大学文学教育密切相关，当时的大学名庠大都有词史或词学课程的开设，如北京大学有刘毓盘讲授词史，东南大学有吴梅讲授词学、中央大学有王易讲授词曲史等。词史的撰写也往往是应授课之需，作为讲义使用的，如刘毓盘《词史》、吴梅《词学通论》、王易《词曲史》等大都如此。这些昔日的讲义，如今早已成为学术的经典，参与、影响着当下的学术研究。刘毓盘《词史》作为第一部通代词史著述，具有开拓之功，对词体文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刘毓盘及其著述

刘毓盘（1867—1927），字子庚，号椒禽，浙江江山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刘履芬（1827—1879），字彦清，

一字泖生，诸生。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迁居苏州，受学王汝玉，与吴中文士多有交游。工骈体文，诗宗黄山谷，有《古红梅阁集》八卷、《鸥梦词》一卷。履芬曾主江苏书局，家中藏书甚丰，且热心词学文献，与晚清词学大家多有交往，宋翔凤《乐府余论》、孙麟趾《词迺》皆赖其重刻以保存。叔父刘观藻（1829—1880），字玉叔，亦工词，有《紫藤花馆诗馀》。

刘毓盘幼承家教，留心词学，弱冠即擅诗词，“九岁学诗，先人授以作诗法。十二，请学词。先人曰：‘小词学唐，慢词学宋，朱竹垞之言也。浙派主协律，常州派主立意，沟而通之，斯得矣。’”（《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自序》，以下简称《自序》）履芬以《花间集》、《草堂诗馀》、《宋六十名家词》等授刘毓盘作词之法，对其词学影响甚大。刘毓盘十三岁时，履芬代理江苏嘉定知县，审理冤狱受人掣肘。履芬知冤而不能救，剪喉自残而死。

刘毓盘幼侍其父左右，父执一辈咸器重之，其词学也深受老辈词家的影响。刘毓盘曾云：“在苏师潘麀生钟瑞丈，丈有《香禅词》；在杭师谭仲修猷丈，丈有《复堂词》，皆先人所心折者。”（《自序》）另外，与郑文焯、刘炳照、蒋玉梭、曹元忠、王鹏运、朱祖谋、江标、吴昌绶等也多有交往，其辑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之举，即缘于朋辈，尤其是曹元忠、吴昌绶的影响。又与吴梅时相过从，吴梅《蠡言》曾述两人的友谊云：“余喜度曲，间作传奇杂剧，子庚辄赞助之，怂恿之，若唯恐不成者。

余少君十馀龄，君以余为忘年交，余不敢当也。”吴梅谱《风洞山》曲二十四折，刘毓盘曾为之填《金缕曲·题风洞山》一阕：“一滴真元血，是天公、撑持世界，作成豪杰。猿鹤沙虫秋磷化，了却中原半壁。生不幸、谋人家国。欲乞黄冠归山去，听桃花扇底娇莺泣。抽佩剑，四空击。靡笄独抱孤臣节。尽昏昏、终朝醉梦，草间偷活。一木焉能支天下，万丈灵光照澈。灰冷透、昆明残劫。遍地都成荆榛域，葬天涯底苦收遗骨。休更向，老僧说。”一时很有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毓盘得拔贡，后屡应朝考，光绪三十三年，始膺拔萃科，得陕西知县（叶恭绰《全清词钞》称其“官陕西云阳县知县”，而吴梅则称刘毓盘尝一膺抚院文牒职，实未得缺）。辛亥革命后，自陕返苏，曾襄浙江图书馆事，其间得见文澜阁藏书。后执教于嘉兴省立第二中学，钱南扬、赵万里、徐震堉等均为刘毓盘此时的学生。继而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一师名师云集，有夏丏尊、单不厂、李叔同、陈望道、刘大白、俞平伯、马叙伦、叶圣陶、朱自清、何炳松等。后来校订出版《词史》的曹聚仁、查猛济，即为刘毓盘此时的弟子。

1919年，刘毓盘到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主讲词史、词、词选、词家专集、诗文名著选等课程。在京曾一度借寓吴梅处，与张尔田、路朝銮等时相过从。1924年应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吴承仕之邀，兼任北师大国文系教授。刘毓盘以词学教授终老，1927年病逝。

刘氏平生文学与著述兼善，其词作深受吴中词人的影响，严于词律，有《濯绛宦词》、《椒禽词》。《濯绛宦词》有光绪二十七年刻本；晚年所作《椒禽词》，多悼亡之什，凄清悱恻，工致动人。关于刘毓盘的创作及风格趋向，吴梅《蠡言》、《笔记》曾评介说：“子庚工于倚声，一字不肯苟且。……其词在白石、白云之间，自谓学清真，实则殊不尽然。”又云：“（子庚）生平雅重万红友，尝谓词学晦塞，至有明而极，至阳羨出而始有所遵式。其《词律》一书，成于旅邸，无书可考，固未免舛误。然今之词家，得有所凭依者，苟非阳羨，谁欤适从。近人好攻前哲，殊不自量矣。继见杜小舫校正《词律》，则又色然而喜，谓足为红友诤友焉。”王易《词曲史》亦云：“《濯绛宦词》，语多寄托。”叶恭绰《全清词钞》选录其词三首，亦见推重之意。诗有《檀香馆诗》，谭献《复堂日记》称其：“颇欲唾弃凡近，五古有近《篋中集》者，尤激赏其《咏兰》二语：‘春花迟暮逢三月，心事馨香又一年。’”骈体文有《濯绛宦文钞》一卷，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

其著述今存《词史》、《文学史》（撰于民国四年，有民国八年铅印本，民国十三年易名为《中国文学史》，由上海古今书店出版）、《唐五代宋辽金元词辑》等，另有《诗心雕龙》、《词心雕龙》、《词学斟注》、《词律斟注》、《词律拾补》、《诗余宫调名考》等，惜多佚。其生平著述情况可参看查猛济《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与龙榆生言刘子庚先生遗书》、《与夏瞿禅言刘子庚先

生遗著书》、《与夏瞿禅言刘子庚先生遗著第二书》，吴梅《与唐圭璋言刘子庚遗事及往还事实书》（见《词学季刊》1卷3号、4号）。

二、作为大学讲义的《词史》

《词史》原为刘毓盘在北京大学讲授词史课程的讲义，曾发表于《东北大学周刊》（第1、2、7、8、31、32、34、36、37、38期，1926.10—1928.03），1931年由曹聚仁、查猛济据其定稿，整理出版。当年，北大教授编纂的讲义大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词史》的学术价值与影响虽不及以上诸作，但对千年词史的撰述却有着开拓之功与先导作用。

今天看来，《词史》显得相当地粗略，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究和规律性的把握。不过，我们应将其置放于具体的历史空间与学术背景中予以评价考察。之所以如此，当然有着多种动因，如民国时期大学的文学教育理念、民初的词学观念与研究积累以及刘毓盘本人词学素养与学术积累等。

首先，作为大学课程的讲义，《词史》与民国时期大学文学教育观念有密切的关联。词是查渺宜修的文体，如何作为一种知识进入大学讲堂呢？具体来说，词史的讲授应包括哪些内容呢？除历代词家词作、词体文学的发展变迁外，是否应涉及词体之学，如词韵、词谱、词律

等；词学研究方法，如考证、校勘、辑佚等；以及填词技巧等，是注重词体文学知识谱系的传授，还是兼及创作与欣赏呢？这些都是讲授词史时需要面对的问题。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晚清以降，讲授中国古代诗文，到底以知识传授为主，还是兼及趣味与技能，是个难题，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知识、技能与情怀》，《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刘毓盘在北京大学的讲课情况，相关材料不多，但以下三则回忆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年修读刘毓盘词学课程，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陆宗达先生曾回忆说：“北大的课分三个专业：文学专业、语言专业和文献专业，我选的课以语言专业为主。……同时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印象最深的有两门：一是刘毓盘先生的词学，分词律、词选和专家词三部分，还要求选课的人每两周交一篇自填的词。刘先生对我的词很赏识，一九二七年，我去了东北，听说刘先生还问起我：‘陆宗达怎么好久不见，他填的词我一读就认得出来。’另一门是黄节先生的汉魏六朝诗。”（《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经历》，《文献》1986年第3期）著名翻译家梁遇春也曾回忆说：“北大近来也多‘故’得很……刘子庚（毓盘）先生也死了，他是弟所爱听讲的教授，他教词，总说句句话有影射，拿了许多史实来引证，这自然是无聊的，但是他那种风流倜傥的神情，虽然年届花甲了，总深印在弟心中，弟觉得他颇具有中国式名士之风，总胜过假诚恳的疑古君及朱胡子等多矣。”（李冰封、唐荫荪《梁遇春致石民信

四十一封》，《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翻译家石民也回忆说：“刘先生是有名的词学专家，也许正为是专家的缘故罢，他讲解词，好比毛公说诗，无非美刺，王注楚辞，尽属寄托似的，实在迂拘得可以。然而他的考试办法却一点也不迂拘，只要你填一首词就是，既不限定题目，也不限定词调，更不限定时间，你可以预先作好，按照考试时间表上的规定钟点到堂上去，用发下的试卷誊正呈交。”（《应征的自述》，《宇宙风乙刊》第43期，1941年4月）陆宗达、梁遇春、石民所忆及的，应是刘毓盘讲授的词、词选、专家词等课程。词律属于专门之学，刘毓盘则擅长词律的研究，曾撰《词律斟注》，其创作也严于词律，所以，讲授词律是其所擅长，也便于从创作上规范学生的填词。词选与专家词，应是他讲授另外两门课程，目的也是让学生懂得欣赏与创作；课程考试也是让学生填一首词。可见，刘毓盘的授课偏重于创作与欣赏，技巧与趣味。

这一风格也体现在词史的讲授中。虽然按照1918年4月30日国文教授会议决议的“文学教授案”之规定：

“文科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习文学史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教授文学史所注重者，在述明文章各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别，至其变迁。递演因于时地才性政教风俗诸端者，尤当推迹周尽使源委明了。”（王学珍《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文学史的教授应另有偏重，刘毓盘

1919年来北大，课程讲授也当依此标准。他在北大讲授的课程主要有词史、词、词选、词家专集、诗文名著选等，其中词、词选、词家专集、诗文名著选则属于“文学”，词史则属于“文学史”，在编写讲义与讲授时，自然应参照上述决议，如对词之起源的探讨，对每一时期词坛流别构成的梳理与概述，尤其是注重从政治兴衰、帝王提倡、制度变迁等方面探讨词体的发展演进等，都受到“文学教授案”的影响。不过，其中也融入了“文学”的成分，再加上这些课程几乎同时开设，彼此也会有所交融。既注重词体文学知识谱系的讲授，又兼及填词与欣赏。这也致使《词史》相对驳杂，不够精审。实际上，这正是课堂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又体现了民国时期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学史教学的某些特征。这与当今大学文学史教学仅关注知识谱系的传授不同。

其次，《词史》的撰述与民初词学观念以及词籍文献的整理有着重要的关系。大致而言，撰写词史所依凭的条件有二，一是相对完善的文献资料，二是对于词体文学历史发展演进的理论把握。仅就前者而言，民国初年，条件已基本具备，当时虽无《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等总集的编纂出版，但从刻词集与词集辑佚工作晚清民初已取得相当的实绩，如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陶湘《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朱祖谋辑刻的《彊村丛书》等；词的辑佚方面，朱祖谋《彊村丛书》补遗辑佚七种词集，王国维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词籍的整

理，为词史的撰述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撑。《词史》在概述每一时段词坛状貌时，即大量参考上述词籍文献。

相对来说，对于词体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与积累，尚较为薄弱。二十世纪初期，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词学”、“词史”等观念尚未明晰，又无可以直接参考的同类著述，也影响了《词史》的编撰。刘毓盘1919年讲授词史之前，北大已有文学史课程的开设，如林传甲、朱希祖、吴梅等，文学史当然会涉及到词，但作为通体文学史，对词的叙述相当简略，加之词在传统文体中的边缘化地位，既显粗略，又不够完整，往往是略述宋词，对宋以后诸代词付之阙如。明乎此，便可理解《词史》粗略罗列材料，缺乏理论探究和规律把握的不足了。

再次，《词史》之撰述，还与刘毓盘自身的词学素养相关。其一，刘毓盘长于创作，从对弟子查猛济的“口出狂言”：“我‘文’不敢自信，‘诗’也不过是第二流的作者……讲到‘词’，那是老实不客气了。”（查猛济《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亦可见其对一己创作的自负。其二，刘毓盘的词学也主要集中于对词律、词调等专门之学的研究上，查猛济也较为肯定老师这方面的成就，称《词学斟注》、《词律斟注》二稿，“价值当倍于词史”，既然是其擅场，所以，《词史》也就难免参杂有这类内容的讨论。其三，刘毓盘非常重视词集文献的整理，《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自序》：“戊戌（1898）入都，临桂王佑遐鹏运给谏、归安朱古微祖谋少宗伯、元和江建霞标京卿、仁和吴伯宛昌绶中翰，方汇刻名家词，使孤本复显

于世，甚盛举也。若本集不传，而其词散见者尚多，自君直辑宋徽宗词外，无议及者。伯宛作《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数以为言。己亥（1899）春，始辑词以为之助。”这种辑佚工作，使他对词集文献非常熟悉，《词史》对词籍文献的大量征引，甚或罗列，即与此密切相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刘毓盘来北大之前，曾有《文学史》的撰述，分文略、诗略、词略、曲略四部分，其中词略部分以“乐府之钩元”、“协律之改字”、“歌辞之流行”、“字义之索解”、“借题之发舒”、“句法之变易”探讨词的早期形态——乐府的发展历程；以“词体之初起”、“小令之初起”、“双叠之初起”、“词集之初起”、“近词之初起”、“慢词之初起”、“大晟之正宗”、“词家之别派”、“白话之人词”、“诗词之分界”、“闺阁之多才”、“词学之极盛”、“国外之风采”、“中声之仅见”、“正轨之将亡”、“弹词之别出”、“新体之纷更”、“图谱之妄作”、“变雅之未成”、“词律之改正”、“倚声之各家”、“音节之略说”等，叙写词之起源以至清代的发展，可称一部简当之词史，对《词史》编撰的影响更为直接。

三、《词史》的理论贡献

《词史》共十一章，从“论词之初起由诗与乐府分”至“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较为完整地概述了千年词史的状态与演进轨迹，对词体文学通史的研究建构起初步的框架。

首先,《词史》能按照“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翦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的演进脉络,既注意系统性,又顾及均衡性,对词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专章论述。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刘毓盘对辽金、元、明词的梳理与探究。辽金、元、明词,一直是词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辽金与两宋大致同时,因两宋词之繁盛,故而在叙写千年词史时,仅着眼于北宋、南宋,对辽金词作鲜有关注;元、明两代,一般被视为词的衰落期,也被学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然,其中也有相关词籍文献整理不足的缘由。《词史》对辽金、元、明词均辟专章予以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词史研究的一段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其次,在叙写千年词史时,刘毓盘强调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多维词史框架。所谓宏观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刘毓盘论述每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政策,注重于政治人心风俗对词坛的影响,从而探讨词史演进的内在逻辑、词学繁荣衰落的各种文化动因。如论五代西蜀、南唐词之盛,则归为帝王的提倡;论南北宋词之别,则云:“北宋之词大,南宋之词深,时为之,亦势为之”;论“明人词之不振”,则归之于有明一代的政治高压政策、科举制义,以及文体演进之“曲盛而词衰”等。虽然,刘毓盘对词史演变的认识还不够系统深入,然其自觉探究词史演进的意识与追求,却是值得肯定的。其二体现为借助于历代选本、晚清以来的词集丛刻,对每一

时段的词家词作予以总体性的介绍，这种方式，看似罗列、排比资料，而实际上较为客观地呈现了不同阶段词坛创作的状态。

所谓中观则体现为，刘毓盘对词人群体、流别的重视。流派与群体是文学史建构的重要元素，一直以来为文学史家所重视。《词史》对每一时代的词人群体与流派做了系统的梳理，如论北宋词则注意苏轼及苏门弟子词人群与以周邦彦为核心的大晟府词人群，论南宋词则注意探讨姜派词人群，论清词则主要介绍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以及吴中词人群体等。

而微观体现为对作家作品的探究与欣赏。词人生平、创作与风格之演进，亦是词史叙写的关键，刘毓盘对历代词人词作的状况有详尽的考辨与探究。探讨作家作品时，刘毓盘注重知人论世，每有精妙之论。如论李后主词云：“后主之词……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语不俊。”论张炎词云：“炎生于淳祐戊申，能世其学。宋亡，年已三十三，犹及见临安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不徒以裁红刻翠为工焉。”同时，他强调词人词史地位与词风演变的批评，勾勒词史发展的脉络。如论张翥词，即指出“宋元人词至张氏而极盛，周旋曲折，纯任自然，出仇氏之门，故无一语可入北曲。其才力差薄者，则时为之也。言词者必曰词敝于元，而不察其病之所在。张氏没后，元室亦衰，能曲者愈多，而词人愈少。王降而风，可以窥世变焉。若洪希文《去华山人

词》、李孝光《五峰词》、袁易《静春堂词》、沈禧《竹窗词》、袁士元《书林词》，名皆出其下。”以张翥为元代词史的分界线，既明确肯定了张翥在词史上的地位，也勾勒了元代词史进程。再如肯定曹溶转变清初词风，对浙西词派的先导作用与开拓之功，“清初人词，多以明人为法，曹溶所以有词学失传，越三百年之叹也。溶尝搜辑遗集，求之两宋，崇尔雅，斥淫哇，浙西填词家，为之一变。朱彝尊等复昌其说以左右之，龚翔麟刻《浙西六家词》，一时翕然无异辞，号曰浙派，则曹氏实启之也。”评价个体作家时，又与群体、时代相融合，这样，以时代为序，上及时代创作总貌与兴衰之因，中论群体流派，下及个体创作，从而构建了多维度的词史框架，为其后的词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需要指出的是，《词史》虽述千年词史之进程，却具有较强的当代性，对晚清以来的词坛观念多有批判与回应。

民初词学观念虽有变化，但其主体仍承晚清而来，晚近词人诸如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等，词学上，多受常州词派的影响，主张比兴寄托，推崇唐五代北宋词，尤其重视清真词，所谓“同光以来，人知汴宋之妙，咸趋《片玉》之轨”（陈匪石《今词选·例言》），周济提出的“由南入北”的词学路径，遂成为清季以迄民国之初所普遍认同的词学途径，在对清代前中期宗法南宋的反拨中，北宋词的成就得到充分的肯定，宗法北宋占据了强势。另外，王国维提出“一代又一代之文学”，认为词

是有宋一代的代表文学，尤重唐五代北宋词。因此，如何评价两宋词，便是词史撰述应当回应的问题。刘毓盘在这个问题上颇为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南北宋词各有千秋，结合时代原因探讨南北宋词风格的差异，体现了融合南北、兼容并蓄的词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鉴于晚清民初对南宋词的批判，而又对南宋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在总结词史时称词“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其中便隐含着以南宋为词之顶峰的观点；另外，他的《文学史》也认为南宋是词学的极盛时期。《词史》第六章“论宋词七大家”，除周邦彦一人为北宋外，其余六家均为南宋，可见他对南宋的推重。之所以如此，当受戈载《宋七家词选》之影响，刘氏曾说：“戈选持论颇公……其论词多可法，其校律尤精，偶有不协者，虽佳词亦不入选。周密《西湖十景》词只登其六首，则其严可知。至所谓七大家者，又古今不易之说，可从也。”当然，这与刘毓盘的词学宗尚不无关系，其词师法周密、张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南宋词的偏嗜。此外，也与《词史》本为讲义有关，课堂教学往往要对历史或当下，尤其是当下的主流观念作出回应，以显示其教学理念的批判性与趣味性。

《词史》对周济《宋四家词选》以及晚近以来词坛崇尚梦窗的批评，也可作如是观。周济《宋四家词选》在晚清民初词坛上每有好评，影响甚大。刘毓盘不仅批评其“既抑苏氏，又以姜夔一家，附庸于辛氏”，论史达祖词时也指出“（周济）持论无乃太苛欤”。另外，周济